

# 关于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

(日)神田信夫 王凌编译

## 一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业已将所藏十五万六千余件庞大数量的宫中档案整理完毕。几年来正在进行影印，首先出版的是《宫中档光绪朝奏折》26册，接着出版了《同康熙朝奏折》9册。目前，《同雍正朝奏折》正在陆续刊行之中。

众所周知，雍正帝对奏折政治最为热心。《雍正硃批谕旨》就是从那些硃批奏折中选出分属223人的约七千件收录而成。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奏折汉文22300余件、满文约900件。即使除去其中仅对皇帝表示问候、没有内容的请安档及重录的复本之外，还达二万一千余件。其数相当《硃批谕旨》所收的三倍。在《硃批谕旨》里所见到的奏折及硃批，原文有的被删除、有的被修改、特别是硃批文字的改窜尤为明显。

我想借《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出版之际，就其与《雍正硃批谕旨》的关系及异同，作些更为具体的调查。首先想试举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为例，这是因为杨琳死于雍正二年二月，其奏折全部被收录在已经出版的《雍正朝奏折》的第一辑和第二辑。我曾于1979年8月，偶然得到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机会，遂逐一调查了该院所载杨琳奏折的原件，发现了在《雍正朝奏折》中未加判明的若干点。下面想就这些结果试作少许叙述。

## 二

首先大体叙述一下杨琳的经历。他的传记集中起来看到的有《满名臣传》卷34、《钦定八旗通志》卷195、《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162，不管哪种都不过是国史馆列传的转载，记事完全相同。根据本传，他是奉天铁岭卫人，属正红旗汉军。关于他的出身，不清楚，但从他亲自给雍正帝的奏折中所述“奴才本以微贱蒙圣祖仁皇帝擢至总兵副都统提督”。可以认为，“微贱”即使是谦辞，其出身也一定不是名门。

据国史列传，杨琳最早当过绿营兵，康熙十八年三藩之乱时，在对吴世璠的征讨中，以守备地位从军，因有功进升为京营的游击，接着做了参将，三十七年成为江南漕标的副将。翌年，在绿营中升至云南临安镇总兵。康熙四十六年迁八旗，被授镶红旗汉军付都统，五十年再度转为绿营的福建陆路提督，接着署福建将军。根据《（乾隆）福州府志》卷35职官8，这是乾隆五十一年事。如根据同书的记载，祖良璧于康熙四十四年被任命为福州将军，直至五十七年去世。杨琳大概是在其中的某一时期代行过这一职务。他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从福建陆路提督升为广东巡抚，接着于五十五年十月擢为两广总督，其后就一直保持这个地位。至雍正元年八月，决定把两广总督分成广东总督和广西总督，杨琳专任广东总督并兼管巡抚

事务，杨琳在任广东总督的第二年二月就去世了。从作为两广总督、广东总督时代的杨琳的上奏文和给他的上谕中，多少能窥见其作为巡抚和总督时的政绩，即传闻他曾为广东的海上防备和沿岸炮台建设努力，成功地处理了广东、广西的盐务。只是国史列传原本作为官吏的履历书，只记载公务行动。

原属正红旗汉军的杨琳，至雍正元年正月，根据雍正帝的特旨，被拨入正黄旗，这个事实国史列传也有，但把正月当作三月。可是，同年三月八日杨琳的奏折里记着“今于本年正月奉圣恩拨入正黄旗”，可知三月有误。再有，同年正月十八日他的奏折引皇帝的旨“传问正红旗佐领吴成章，着将奴才弟男子侄及佐领所管人，俱拨入正黄旗都统下行走”。就是说杨琳正是这个佐领的属下，而正黄旗是皇帝所属的上三旗，是从诸王所属的下五旗中特别提拔而成的。

杨琳在三月八日的奏折中有如下叙述：“奴才系在十阿哥属下，自五十四年擢授广东巡抚，任内即应酬不暇，奴才门下，犬马敢不承受。除抑勒属官，颠倒是非之钱，奴才素名节自矢，断不敢取。武官并无交接，惟文官内有谨慎安分者，所送礼节不得不拣择收受，以应王府之用。然尽其所入，不足所供。奴才儿子杨宴，于五十八年除授兵部郎中、即拘留差使、催交银两，派办草料，盖造花园，一应差使。除奴才任内每年所有之外，并将京中住房及素日所有之过活资本，尽行折变，抑且负债难逃，皇上圣闻者也。奴才惟念圣祖仁皇帝养育厚恩，所以隐忍苟活”。十阿哥，即康熙帝的皇十子胤祺，他和皇九子胤禩及皇十四子胤禵同是附于皇八子胤禩的，是属于和雍正帝对立的一派。杨琳就这样成为与雍正帝对立的胤祺的属下。在他任两广总督时，胤祺派遣宦官利用署内进行非理搜索，他也无可奈何。以上所举杨琳奏折的记事，是他成为广东巡抚以来，对于王府的贪婪以及为答应这些贪婪的要求，如何免于负债之难等亲身体验的具体叙述。这对了解当时王府的横暴无疑是贵重的史料。

可是，雍正帝一即位形势就变了，帝把杨琳拨入属自己支配的上三旗的正黄旗，从胤祺属下脱离。杨琳对于给他的处置大大地感激，雍正元年正月始，他在报告中说“是奴才素日所不敢言者，皇上深知之；奴才梦寐所不敢望者，皇上特全之。不特奴才从此得以苟活，即子子子孙亦从今日得超生圣世而閤佐领之官兵壮丁皆受无疆之福矣”。而且对雍正帝“皆朕之所素夕洞鉴之情，只要你做好官以报朕耳”的硃批表示理解。杨琳在其后的奏折中，对拨入正黄旗表示谢恩。如同年三月八日的奏折中述“本年正月、奉圣恩拨入正黄旗，出汤火而登衽席、从此一家大小得有活路”。八月二十三日的奏折又言“再臣蒙皇上圣恩，拔置上三旗，子子子孙得有生路，难图报答”。九月二十四日的奏折述及“又拔置上三旗，破格保全，天地父母之恩无以复加”。这样杨琳作为雍正帝忠实的地方大官，成为报告地方情报的耳目，为地方政治尽力。

### 三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在所藏杨琳奏折共41件，其中有一件仅仅是对皇帝问候的请安折，硃批上仅有“朕安”，所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里没有收录。除了这件请安折，还有后述别的一件之外，其余39件全部被收录在《雍正朝奏折》的第一辑第二辑里。根据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杨琳以“为恭缴硃批谕旨”为题的奏折，准许杨琳用奏折上奏，因为康熙五十年他被任为福建陆路提督。提督时期的硃批奏折17件13封、广东巡抚时期28件17封、两广总督时期

38件24封，合计83件54封，其他没有硃批的奏折44件36封，俱应缴回。可见杨琳拿出很多康熙五十年以后给康熙帝的奏折，是一次退回还是被缴回？现在是否还留存着？都不清楚。至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象是无存，去年刊行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一件也没有收录。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收录杨琳奏折39件，但《雍正硃批谕旨》内采录27件。《硃批谕旨》以公刊硃批为目的，没有硃批的奏折都没有采录。现存雍正朝杨琳的奏折有多少是缴回的硃批奏折呢？雍正元年三月二日以“为恭缴硃批谕事”为题的奏折，有对广西左江镇总兵马振图进行人物评价等，因为有硃批，所以《硃批谕旨》里收录了，但删除了原文书的若干文字。根据原文书，对于杨琳最初呈递请安折赐予“仍前勉力，做好官，更加勉力（钦此）”的硃批。在《硃批谕旨》里，只有“奉到硃批”而硃批的具体文字被删除了。

总之，杨琳为了上缴硃批奏折，逐一呈进奏折，但以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告终，因为这个月他死了。根据雍正元年三月二日、五月十三日、七月九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六日、同二年二月十五日各日的六件奏折，应该有22件硃批奏折被缴回，可是原文书留存下来的只有五月十三日琳批奏折5件、六月十二日的1件、七月九日3件、八月五日1件，何时缴回不清楚。杨琳在雍正元年除二月和十月外，每月都有奏折呈进，从五月十三日到七月九日缴回的硃批奏折，都没有看到，难道缺十月左右呈进的奏折吗？杨琳的奏折虽然比较好的留存下来，但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仍然很难说完全。

把杨琳奏折的原文书，或者说把《雍正朝奏折》和影印的《硃批谕旨》的文字比较一下看，后者除奏折的文字有不少被删除外，硃批文字的口语用法在文体上有所改变。举例言之，首先原文书是墨批，而《硃批谕旨》中改成硃批，这是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的2件奏折。因为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的生母仁寿皇太后驾崩，正在丧中的原因。其次，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杨琳和年希尧、冯毅三人联名以“为奏报盗首全获事”为题的奏折，三个具奏人姓名上都冠有“奴才”二字，但用墨批抹掉了，在其右旁订正为“臣”，在上部的空栏里写有“向后都用臣字得体”。历来有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之例，但雍正帝把奴才的称呼改为称臣。根据《雍正朝奏折》，在雍正元年三月九日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中，开始出现针对“奴才”写有“向后称臣得体”的硃批。此后在佟世铸和何天培等的奏折中，虽每次文字有若干异同，但都写有同样趣旨的批语。而且杨琳的奏折，自六月十二日以后，代替“奴才”二字的全部是“臣”。可是《硃批谕旨》所收录最初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的奏折，全部是作为“臣”出现的，而最初是称“奴才”这一事实不会不知道。

#### 四

下面，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杨琳的奏折及有关文书的结果，做若干叙述。

首先，在《硃批谕旨》里没有收录的但在《雍正朝奏折》里收录了。如杨琳于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以“为回奏事”为题的奏折即是。这个奏折，是他对四月二十七日收到的三月二日奏折上的硃批“向后若有此等可去之员，即将尔本省有才守兼优有用之员密奏，朕酌量发旨补用，不论文武官，皆如此。即两司总兵副将不妨尽尔之所知密奏来”的返答。两司，不用说是布政使和按察使。杨琳所言“广东广西两省文武官员，如有贪婪不职及庸懦老疾者，会同巡抚、提督不时参处，不敢姑容”是就两司、总兵各人在具体方面进行的人物评价。只是对被新任命的广西布政使和按察使，还未着任的不算。广东的碣石总兵和琼州总

因未被任命，在这里除外。关于广东左翼总兵汪铨、按察使梁文科、右翼总兵谢治、潮州总兵侯濂、高州总兵蔺佳进、南澳总兵陈良弼、布政使王朝恩的叙述，特别是汪铨和梁文科以不适任，请求皇帝圣裁调用，其他五人只不过俱因“循分供职”没有特别推荐。在这里他继续叙述“所有文职道府州县内、武职副将内、择其或有才、或有守、或谨饬自持、或历练营伍，两省文职汇列一折、两省副将汇列一折，各注其所长，恭候圣明采择”。再有在本文终结后记有“计进呈东西两省应举文武官员衔名二折”。总而言之，与这个五月十三日的奏折同时，应该把从文职的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及武职的副将中推荐者的名单、记于折后，进呈文职武职各一件给皇帝。可是，《雍正朝奏折》没有收录这二件推荐名单的折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点检杨琳奏折原文书之际，偶然得知存有这二件的折本。现在同院所藏宫中档中、每件编一个号，但对于五月十三日以“为回奏事”为题的奏折，编号是15116，名称是作为文职一方，编号是15119，武职一方是作为其附件。因为在这个名单里，全部没有记载年月日，所以《雍正朝奏折》可能也没有收录，但这是五月十三日奏折的附属物，这点是很明确的。这个名单是了解当时人物评价实情的贵重资料。

## 五

再有，成为问题的是七月二十六日杨琳的以“为恭缴谕旨事”为题的奏折。在《雍正朝奏折》里收录了包括这件在内的他的三件奏折。但在《硃批谕旨》里，一件也没有看见。

以上，关于初为两广总督后为广东总督的杨琳的奏折，是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文书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和《雍正硃批谕旨》里收录的情况加以对比、考察来看的。其结果可以断定，《硃批谕旨》象已说的那样，又删除了奏折的原文，又改变了硃批之外，日期等也有误，未收录的奏折也相当多。杨琳的奏折比较好的保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被收录在《雍正朝奏折》里，但还有若干应该留存而现在无存的东西。再有，关于附件，不论现在留存与否，在《雍正朝奏折》里有未收录的东西。

由于宫中档奏折的影印，尽管有庞大数量的奏折，但看起来也非常便利。可是以杨琳一例来看，根据情况，还是有必要看看原文书的。